

---

## 自我认知与发展战略

### ——中俄“带盟”对接的现状与阻碍对接的原因分析\*

欧阳向英 房晓辉

自我认知和发展战略看似与“带盟”对接不相关，却在深层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在民族心理和前行方向上的差异，因此会影响中俄合作的深度、规模和走向。自我认知关注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主要有西化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发展战略关注的是“怎么办”这个问题，在现实层面表现为“向东还是向西”“孤立还是合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似乎始终没有回答清楚“我是谁”和“怎么办”的问题，折射出其发展中的思想障碍。这个障碍无形地存在于俄精英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因而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和分裂。乌克兰危机后，新欧亚主义前所未有地占据上风，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树大根深，导致俄精英层部分人士对东向战略持有戒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深入对接。“带盟”对接的实质性深化，有待剔除某种极端主义倾向的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精英层得到更深刻的认同，有待欧亚大陆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得到更广泛更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带盟”对接 自我认知 国家战略 新欧亚主义 欧亚经济联盟

2015年5月，中俄两国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一带一盟”对接（也称“带盟”对接）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几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对接有了初步收获，然而还落后于双方预期。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刚刚达到两国元首于2014年提出的1000亿美元阶段目标，要想在2024年达到两国政府于2019年提出的翻番目标，任务艰巨。因此，找到阻碍“带盟”对接的原因，并提出化解之道，为双方经贸合作打开新空间，就成为该领域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拟从自我认知和国家战略视

---

欧阳向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Email: oyxymail@126.com；房晓辉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商学院教授。

\*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

角，分析阻碍“带盟”对接的认知因素和战略分歧，提出俄罗斯精英阶层在自我认知上长期纠结，导致发展战略左右摇摆，是妨碍“带盟”对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接的实质性深化有待剔除某种极端主义倾向的新欧亚主义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也有待欧亚大陆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得到更有力的支撑。

## 问题提出

以“一带一盟”和“‘带盟’对接”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可以看出，2015—2019年，中外学者对“带盟”对接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基本情况和战略研判”上，其次为“路径、对策与前景”，分析障碍和破解之道的并不多。有些俄罗斯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俄罗斯希望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使后苏联国家优先接受欧亚一体化计划，并将地缘政治对手“挤出”该地区；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为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西亚、俄罗斯和欧洲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并建立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两者存在明显的分歧。俄罗斯参加“一带一盟”对接，主要是把此“作为保障中国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施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手段”，而不是形成共同体或一体化；如果开放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内市场，来自中国的不平衡竞争将毁灭成员国的地方工业。<sup>1</sup>中国学者多从具体操作层面入手，如柴瑜、王效云指出，受对接涉及主体多、利益诉求多元化、信息沟通尚不对称等影响，对接中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错配上，即期待错配、领域错配、主体错配和环境错配；<sup>2</sup>刘彦君指出，中俄经济合作依然面临认识和心理上的偏差、制度执行不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经营主体与融资及经贸合作的腹地效应等诸多问题，极大制约了两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sup>3</sup>张艳璐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性质与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欧亚地区各国间所存在的利益竞争、认识上的不同以及内外环境的不利影

---

<sup>1</sup> 王宪举：“俄罗斯对‘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的态度以及我国应采取的策略”，《北方经济》，2016年第8期，第9页。

<sup>2</sup> 柴瑜、王效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基础、挑战与环境塑造”，《欧亚经济》，2018年第5期，第12~16页。

<sup>3</sup> 刘彦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俄经济合作：新趋势、挑战及应对”，《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02页。

---

响。<sup>4</sup>中亚学者更关心“带盟对接”给中亚带来的影响，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本身就是欧亚一体化战略的竞争者，因此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既不与俄罗斯产生矛盾又不损害俄中关系的前提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up>5</sup>总的来说，“带盟”对接的前两年，即2015—2016年，中国学者的看法往往较为乐观，而外国学者对作为倡议的“一带一路”与作为机制的“欧亚经济联盟”如何对接感到困惑。对接进行了两年后，在2017—2018年，双方研究者的观点有了反转。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对接的障碍和风险，而外国学者则看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和战略意义。有学者注意到，尽管外国研究者对“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有诸多担心，但对其对接前景的评价已慢慢从负面转为正面居多。<sup>6</sup>

“带盟”对接于俄罗斯而言，是其东向战略的具体体现，而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0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使中俄合作的内容有了明显拓展。此后，全球战略和国际格局的考量取代了原来较为单一的经济合作视角。中俄究竟能在哪些领域进行密切合作？如果合作尚有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启发学者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历史和文化探究。有学者认为，不对称性是导致中俄对“一带一盟”产生认知分歧的根本缘由，而相互依赖及利益互补则是中俄能够超越国家利益界限与分歧，促使“一带一盟”融合共生并形成对接合作共识的深层动因。<sup>7</sup>把认知分歧与合作共识置于更加显著的地位予以考察，也是笔者的初衷。但本文的聚焦点并非国际关系上的不对称性，而是今天的认知分歧在历史上的源头，以及现实中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案。历史上，俄罗斯思想界对国家发展方略的认识就不一致，主要分为三派，西化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在考察了三派的来源和观点后，笔者将希望寄托在新欧亚主义上，认为这是解决认知分歧的重要路径。最终，笔者将经济计算与战略考量结合起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带盟”对接的问题与前景，以期推动“带盟”在更高水平上深入对接。

---

<sup>4</sup> 张艳璐：“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基础、阻碍与对策思考”，《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3期，第60~63页。

<sup>5</sup> [哈]康·瑟拉耶什金：“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其对中亚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21~22页。

<sup>6</sup> 杨希燕、陈秋容、唐朱昌：“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一带’、‘一盟’及其对接”，《欧亚经济》，2018年第5期，第52页。

<sup>7</sup> 焦一强：“由认知分歧到合作共识：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研究——基于不对称性相互依赖的视角”，《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51~85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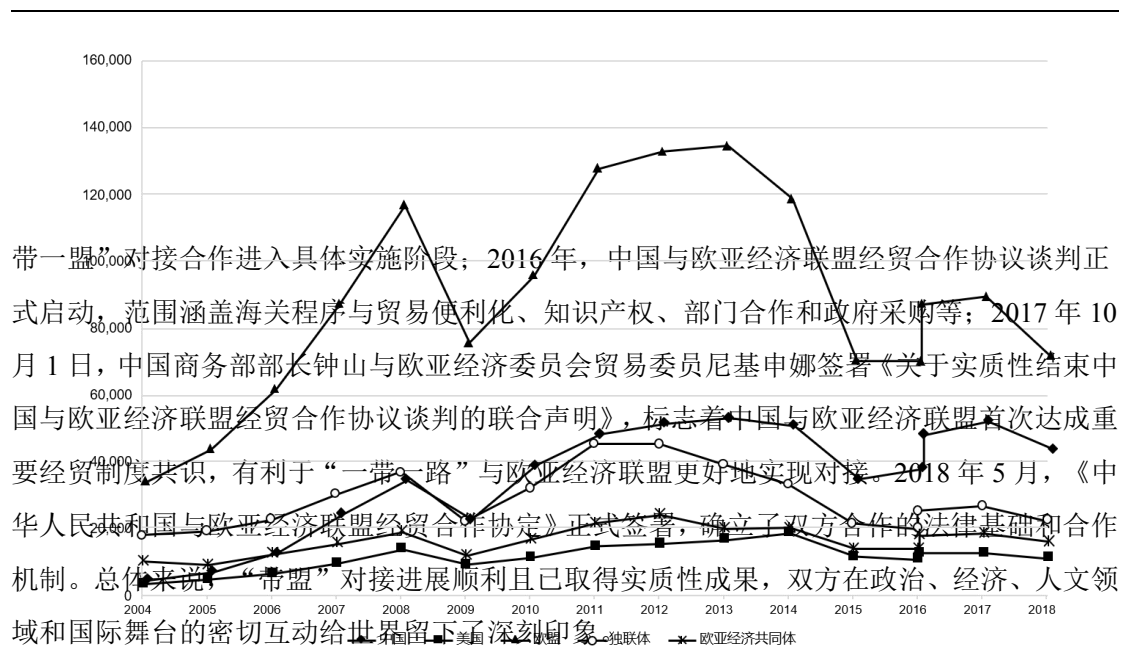
## 中俄“带盟”对接的现状评估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 2015 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各成员国地位平等，联盟所做决议遵守“成员国一致同意”原则。因此，“带盟”对接严格意义上应该是 1+5，总共包括六国。但是，通常所说的“带盟”对接就是指中俄，而与哈萨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对接、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稳定发展战略对接、与白俄罗斯 2030 年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战略对接、与亚美尼亚 2014—2025 年发展战略对接，有如下几方面原因。客观上讲，俄罗斯在联盟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发起倡议，到制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都是俄罗斯起主导作用；二是在关税收入的分配上，俄罗斯占绝对大头 87.97%，而白俄罗斯占 4.70%，哈萨克斯坦占 7.33%。<sup>8</sup>主观上讲，俄罗斯是把“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不是联盟内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的。这个设计利弊兼有，后面还要具体分析。在此，就按约定俗成的办法，重点分析中俄“带盟”对接的现状及其阻碍因素。

中俄“带盟”对接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有实际项目的签署与推进，也有制度安排的谈判与对接。从实际项目看，能源领域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亚马尔项目第一条液化天然气（LNG）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是“一带一盟”的首个特大型对接项目，也是全球最大的北极 LNG 项目；华电捷宁斯卡娅燃气蒸汽联合循环供热电站项目是中国在俄罗斯最大的电力能源类投资项目；俄罗斯也将在中国承担田湾和徐大堡等一系列核电项目的总设计和配套供应。航空领域，双方于 2017 年在上海共同成立了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达 130 亿美元，用于 CR929 远程宽体客机的研发生产，目前主要项目已接近尾声，预计有良好的市场前景。金融领域，2014 年俄罗斯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 1500 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已经落实；2018 年批准设立首期 100 亿元、总规模 1000 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旨在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2015 年联合设立资本规模为 100 亿美元的中俄农业投资基金和首期资金 130 亿卢布、资本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的中俄远东农业发展基金，支持俄罗斯对华农产品出口。从制度安排看，2015 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标志“一

---

<sup>8</sup> В ы с ш и 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 “О размерах (шкале) долевых взнос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 – членов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бюджет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10 октября 2014 года, [https://docs.eaunion.org/docs/ru-ru/0124204/scd\\_13102014\\_79\[2018-11-12\]](https://docs.eaunion.org/docs/ru-ru/0124204/scd_13102014_79[2018-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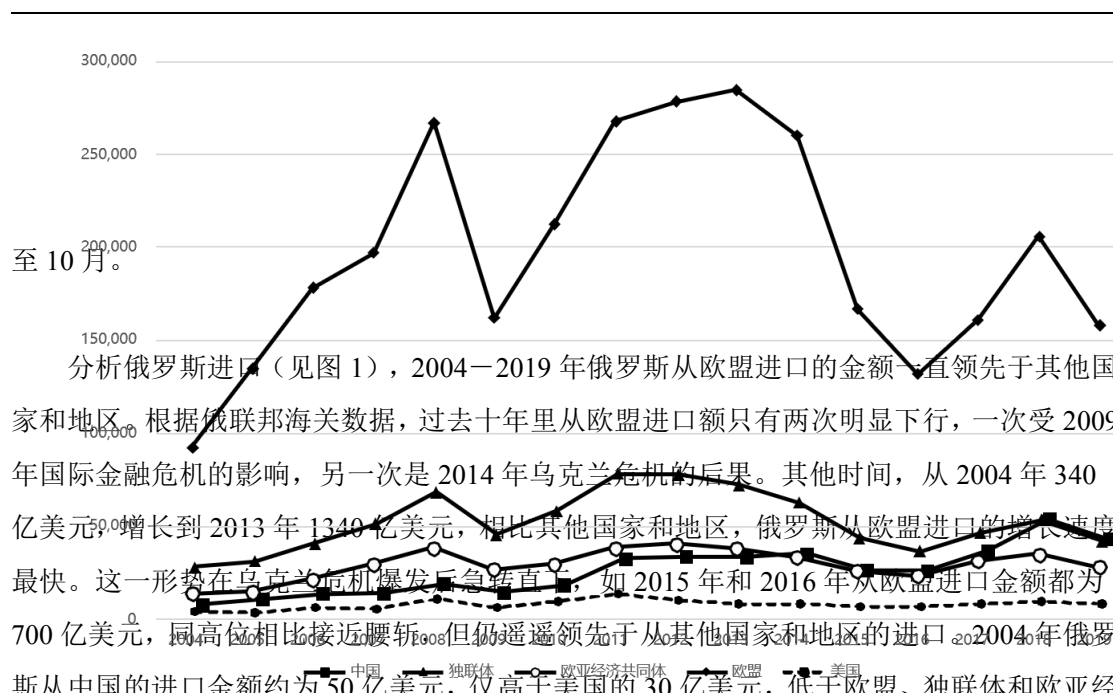
带—盟”对接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2016年，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正式启动，范围涵盖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部门合作和政府采购等；2017年10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委员尼基申娜签署《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首次达成重要经贸制度共识，有利于“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更好地实现对接。201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签署，确立了双方合作的法律基础和合作机制。总体来说，“带盟”对接进展顺利且已取得实质性成果，双方在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和国际舞台的密切互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济合作是中国“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出发点，也是其他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目前两国经济合作还远远落后于双方预期，原因是多重的。下面从中俄两国各自的对外经贸关系入手，分析双方合作的规模、增速与比重等具体指标，揭示目前俄罗斯对外经济联系的真正重点所在，并进一步分析阻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自我认知和对外战略因素。

图1 俄罗斯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口金额对比（2004—2019年，单位：百万美元）

注：欧亚经济共同体于2001年成立，2015年撤销，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图中2015年后欧亚经济共同体数据为俄罗斯与其他四国的贸易数据。此图由作者整理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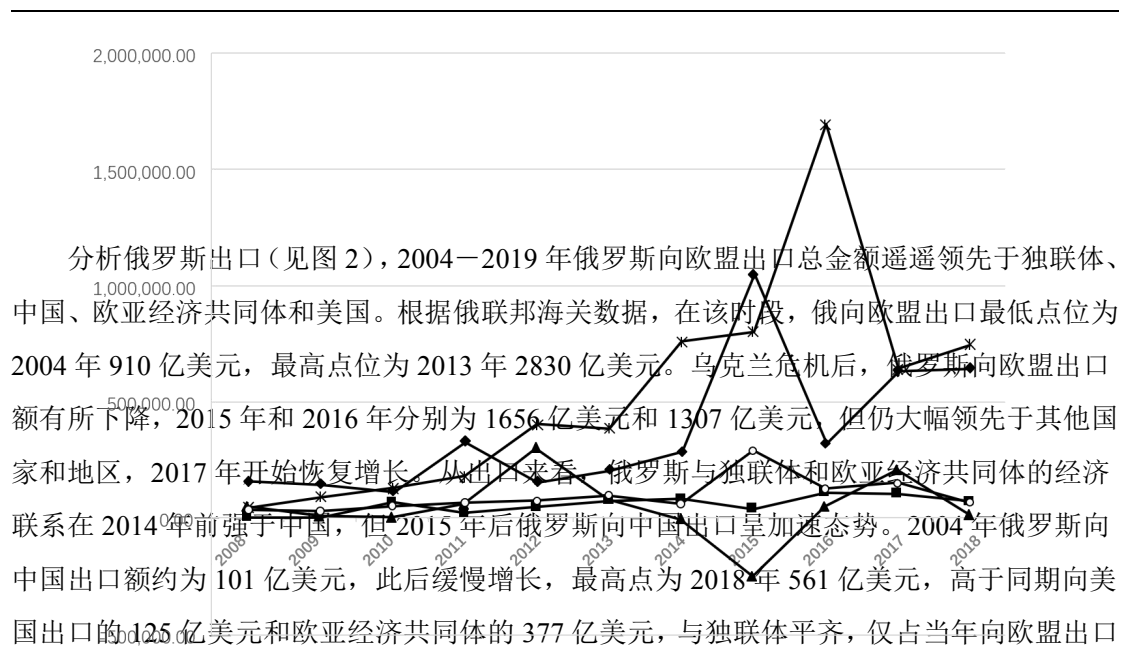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 全球宏观数据库。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数据编制，其中2019年数据截



分析俄罗斯进口（见图 1），2004—2019 年俄罗斯从欧盟进口的金额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据俄联邦海关数据，过去十年里从欧盟进口额只有两次明显下行，一次受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次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后果。其他时间，从 2004 年 340 亿美元，增长到 2013 年 1340 亿美元，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俄罗斯从欧盟进口的增长速度最快。这一形势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急转直下，如 2015 年和 2016 年从欧盟进口金额都为 700 亿美元，同高位相比接近腰斩，但仍遥遥领先于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2004 年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金额约为 50 亿美元，仅高于美国的 30 亿美元，低于欧盟、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2010 年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显著增加，超过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但远远低于欧盟。2012—2014 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达到高位，每年都超过 500 亿美元，但仍不到从欧盟进口额的一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从欧盟和中国进口金额都有所下降。在中俄经贸关系得到明显加强的背景下，2019 年前 10 个月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额为 438 亿美元，而同期从欧盟进口额为 715 亿美元，仅为后者的 61%。

图 2 俄罗斯向不同国家和地区出口金额对比（2004—2019 年，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全球宏观数据库。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数据编制，其中 2019 年数据截至 10 月。



分析俄罗斯出口(见图2), 2004—2019年俄罗斯向欧盟出口总金额遥遥领先于独联体、中国、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美国。根据俄联邦海关数据, 在该时段, 俄向欧盟出口最低点位为2004年910亿美元, 最高点位为2013年2830亿美元。乌克兰危机后, 俄罗斯向欧盟出口额有所下降, 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1656亿美元和1307亿美元, 但仍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7年开始恢复增长。从出口来看, 俄罗斯与独联体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经济联系在2014年前强于中国, 但2015年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呈加速态势。2004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额约为101亿美元, 此后缓慢增长, 最高点为2018年561亿美元, 高于同期向美国出口的125亿美元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377亿美元, 与独联体平齐, 仅占当年向欧盟出口金额的27%。俄罗斯向欧盟的出口金额, 每年都超过向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和美国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总和, 所以即便单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讲, 俄罗斯也不可能不重视欧洲。

图3 中国对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2008—2018年, 单位: 万美元)

数据来源: Wind全球宏观数据库。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编制。

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见图3), 总体来看, 2011年后资本对外输出增长显著。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大幅超过同期对俄投资的29.6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更飙升至170亿美元，而中国对俄罗斯同期直接投资萎缩到13亿美元；2017年受美国对华投资加大审查力度和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大幅缩水到64亿美元，仍超出对俄同期投资的15.5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一枝独秀，不仅远超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伙伴新加坡、马来西亚，也远远超过吸收中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一直较为稳健的泰国和哈萨克斯坦，这一状况直至2018年发生改变。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共占总量的90.3%，其中，除去两个离岸金融中心，其余八个全部都是发达国家（地区）。<sup>9</sup>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可以避开民族宗教极端因素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深层风险，对美投资增多恰恰是经济因素起作用，而对美投资减少则是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已经普遍注重投资安全和资本收益最大化，而尽量避免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和政权更迭的负面影响。这也从侧面提示，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虽然政治互信得到保证，但经济因素不可忽视。为吸引更多外资，俄罗斯应更加深入地研究资本的投资偏好，改善营商环境，提振投资信心，因为逐利是资本的第一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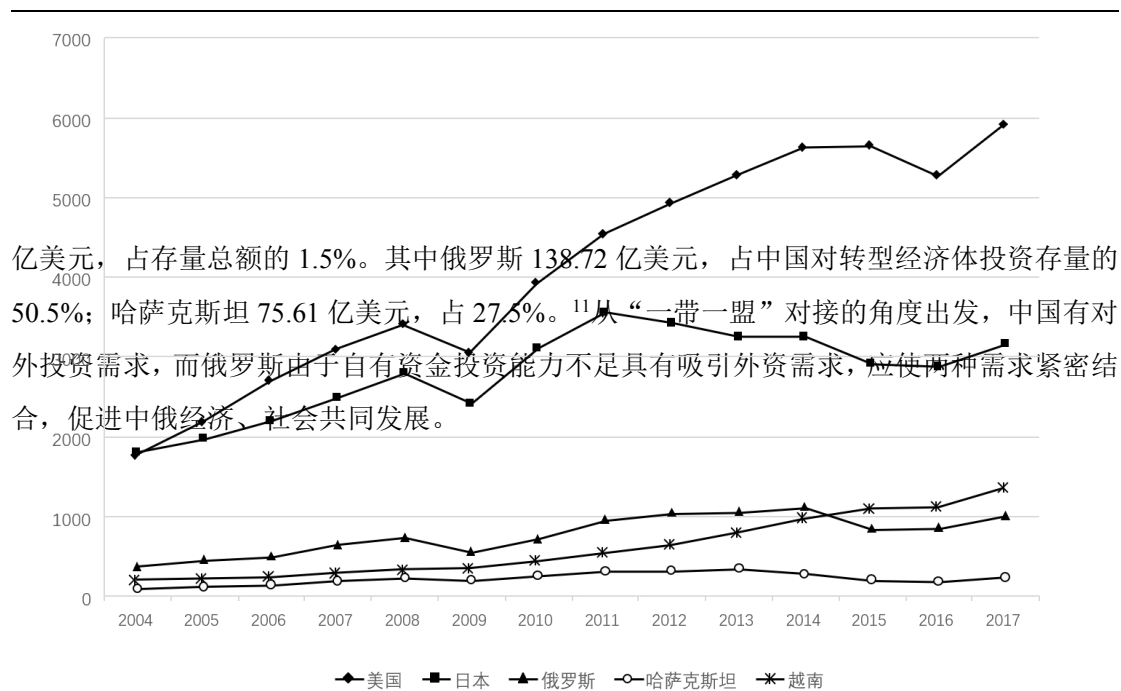
如果将考察的范围扩大，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就会发现第二个鲜明特点，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东盟）、中东（西亚）和南亚地区，其中东盟吸引了超过一半的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到146.4亿美元，占“一带一路”相关区域投资流量的77.24%。由于俄罗斯与东盟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法律体系、市场成熟度等方面缺乏可对比性，可将俄罗斯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进行对比。从图3看，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从2014年后呈显著增长势头，而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则在2012年冲高后一路下滑。在整个中亚范围内，2015年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三个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流量都超过哈萨克斯坦，但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存量最高，占中国对中亚总投资的62.98%。<sup>10</sup>2016年后，哈萨克斯坦更加重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对接。2017年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俄罗斯，并呈持续上升态势。2017年末，中国在转型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74.93

---

<sup>9</sup>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

<sup>10</sup>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2~83页。





亿美元, 占存量总额的 1.5%。其中俄罗斯 138.72 亿美元, 占中国对转型经济体投资存量的 50.5%; 哈萨克斯坦 75.61 亿美元, 占 27.5%。<sup>11</sup>从“一带一盟”对接的角度出发, 中国有对外投资需求, 而俄罗斯由于自有资金投资能力不足具有吸引外资需求, 应使两种需求紧密结合, 促进中俄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图 4 中国年度进出口总额 (2004—2017 年,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Wind 全球宏观数据库。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编制。

从对外贸易来看, 中俄在贸易结构和总量上还有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7 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相比 2013—2014 年有所下降, 但也高达 41072 亿美元。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出口国, 中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额 2018 年超过 1000 亿美元, 与此前多年居于 700 亿~800 亿美元之间相比有了很大进步, 但相比中国内地与欧盟、美国、东盟、中国香港和日本的贸易额,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进出口总量上, 目前俄罗斯与越南规模相当, 但 2015 年后越南与中国贸易增速很快, 超过俄罗斯 (见图 4)。目前, 俄罗斯对华出口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 以及军工产品和动物产品, 从

<sup>11</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第 3 页、第 21 页和第 62 页。

---

中国进口成套机械、办公设备、纺织品和家电等。未来，中俄应挖掘并扩大在粮食和其他农业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根据电子商务企业协会（AKIT）数据，2018年俄罗斯电子商务增长59%，市场规模达到255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占全部外国订单的92%。

中俄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联系自2012年后日益密切，这有赖于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赖于高层政治互信和民间交流的加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正式提出“带盟”对接以来，除了投资额的斜率在当年陡然变大，其他指标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俄罗斯与欧盟和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关联度仍超过中国，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经贸合作规模与数量也远远超过中俄。之所以如此，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也有俄罗斯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经济联系较为稳定，合作模式日渐成熟。反观俄罗斯近年来经济不断下滑，仅有一些盈利项目被划归战略产业限制外资进入<sup>12</sup>，市场环境欠佳，汇率波动较大，国际竞争力不强，阻碍了中国投资者进入俄方市场，以上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此外还有文化上的考量。回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环境之不利较之今日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大批海外华侨毅然决然投资祖国，甘冒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良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在于华侨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心。而俄罗斯暂无此外部条件，相反受到西方国家的群体制裁和包围，想利用华资就更需消除华人疑虑，使其不再恐惧俄罗斯“随时可能罚没收入”的投资环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俄双方是否有真诚的合作意愿和持之以恒的投资行为，不仅依赖于外部的环境，也取决于政府的推动和精英的认知。鉴于绝大部分华裔对俄并无偏见，所担心的只是市场环境和投资风险，<sup>13</sup>那么敦促俄罗斯精英层抛弃成见，真诚接纳中国的项目和人员，为之提供便利条件，就成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尽管新欧亚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西化派与斯拉夫派在俄精英层占有牢固地位，他们认为对华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国家真正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力推动与东方国家密切合作的人并不多。笔者认为，这才是妨碍“带盟”对接的深层原因。

---

<sup>12</sup> 《俄罗斯联邦关于外资进入具有国防和国家安全战略意义之商业组织的程序法》共包括17个基本条款，42个战略性行业名录。

<sup>13</sup> 欧阳向英：“俄罗斯与中国：错位与对接——谈‘一带一盟’对接中的问题与出路”，《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第56-58页。

---

## 自我认知和发展战略的不确定性阻碍“带盟”对接

自我认知是对自己的识别、洞察和理解，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主要有西化派、斯拉夫派和欧亚派。西化派始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盛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有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和格拉诺夫斯基，而斯拉夫派的代表是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萨马林等人。斯拉夫派认为，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但在精神层面应保持俄罗斯民族固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沙皇政府的“官方民族性”理论；<sup>14</sup>西化派则认为，西方文明要高于东方文明，而斯拉夫文明本质上是东方文明，因此俄罗斯不仅要吸收西方成熟的物质成果，更要在风俗、立法、组织、所有制、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革，才能改变斯拉夫文明的东方属性，最终使俄国像西方一样走上富裕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sup>15</sup>简言之，西化派认为俄国与西欧的隔绝是造成俄罗斯野蛮、愚昧和专制主义盛行的原因，必须加以西方式的改造，而斯拉夫派认为东正教和村社的永恒存在决定了俄国精神和发展道路上的独特性，不应沿袭西方的发展模式。两者在历史上尖锐对立，影响都很大。而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侨民中间的欧亚派从来没有产生过重大影响，直至50年代被古米廖夫重新拾起并将其发扬光大。从彼得·萨维茨基到列夫·古米廖夫，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已经成型，而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和亚历山大·帕纳林是新欧亚主义的代表。新欧亚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最先在俄国引入了“地缘政治”概念，把欧亚洲作为一个统一的精神文化空间，既反对将“斯拉夫性”特殊化，又反对照搬西方的一切，从而发展出一种折中主义。<sup>16</sup>

发展战略是在一段时期内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发展点和发展能力的规划，解决的是“怎么办”，与自我认知相关联，在现实层面表现为“向东还是向西”“孤立还是合作”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尤莉亚·西涅奥卡娅说，“关于新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斗争的核心

---

<sup>14</sup> 曹维安：“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130~131页。

<sup>15</sup> 姚勤华：“19世纪俄国斯拉夫主义思想和运动研究”，《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第70页。

<sup>16</sup> 张海鹰：“20世纪20年代俄国侨民界对欧亚主义的批评”，《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3期，第190页、第209页。

---

问题，就是俄罗斯应该执行孤立主义路线还是加强与世界的合作”<sup>17</sup>。其实，孤立主义明显不可取，因为全球化背景下即使想要闭关锁国也不可能，更何况俄罗斯从来不以地区小国自居。所谓西化派、斯拉夫派或欧亚派争论的无非是多程度上向世界开放，以及首先向世界的哪一部分开放的问题。“新西化派”融入欧洲的主张在俄罗斯国内外都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将加入欧盟作为自己的目标，乃至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呼吁建设“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大欧洲”，也难说不是对该派主张的回应。但是，从2008年俄格战争开始，俄罗斯就已经认识到，大欧洲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此后欧洲对二战史的改写和对克里米亚事件的谴责更使俄罗斯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丑化苏联和孤立俄罗斯的风潮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欧洲议会的默认，更使得俄罗斯有心向欧但无力回天。再看斯拉夫派，在现代表现为索尔仁尼琴倡导的“新斯拉夫主义”，也不能为俄罗斯提供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新斯拉夫主义”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才是具有统一的种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东斯拉夫民族“自己人”。这种想法似乎有些狭隘，不能凝聚多民族国家和后苏联空间的精神力量。斯拉夫派是与西化派对立的，西化派广为歌颂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恰恰是斯拉夫派谴责的对象。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斯拉夫派既不认同苏联的政策，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而是强调自下而上地发挥人民的作用，走符合俄罗斯民族特点的道路。<sup>18</sup>然而，不谈实际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企图借助民族心理的共通找到一条“纯净的斯拉夫化道路”是行不通的。近年来，新欧亚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主要原因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2016年6月，普京发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这意味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外交战略做了现实主义调整。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系主任卡拉加诺夫、欧洲和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兼“瓦尔代”俱乐部欧亚项目负责人季墨菲·博尔达切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欧亚”的构想与进程发表一系列著述，可以看作新欧亚主义在理论层面的进一步完善，与“正统的新欧亚主义”奠基人杜金提出在“第四政治理论”和“多极世界理论”基础上构建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相呼应，通过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以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用大陆

---

<sup>17</sup> [俄]尤莉亚·西涅奥卡娅著，华铭译，邢立军校译：“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第252页。

<sup>18</sup> 刘文飞：“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2期，第87~88页。

---

文明对抗海洋文明、以欧亚大陆一体化反对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单极化。<sup>19</sup>杜金曾设想把“欧亚联盟”扩展到南方，包括伊朗和印度。<sup>20</sup>而普京在2016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对“大欧亚”地理概念的界定——“建设有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我们的独联体伙伴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组织参与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似乎验证着新欧亚主义者的战略构想。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版图最辽阔的国家，如何实现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是难题。地跨欧亚大陆既赋予俄罗斯思想界更多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也使他们陷入“向东还是向西”的苦恼。在沙皇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早期俄罗斯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又与阿尔泰—蒙古文化融合；彼得大帝亲政后转向西方，寻求成为欧洲一员，但构筑了俄罗斯文明根底的泛斯拉夫主义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苏联时期与西方对抗，但苏联末期乃至俄罗斯初期推行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就连最近几年提出来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也试图将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都纳入其中，只是目前欧盟对这一倡议并不认可，才使得西向连横的想法缺乏可行性。<sup>21</sup>可以说，俄罗斯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认同一直在摇摆，以致对一些基本问题，如俄罗斯是否是欧洲国家、是否有独立的俄罗斯文明、俄罗斯发展道路与人类整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都存在争议。<sup>22</sup>相比树大根深的西化派和基于民族心理的斯拉夫派，欧亚派在俄罗斯精英层中不占优势。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德·谢·利哈乔夫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属性的不是其地理位置，而是国家起源、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因此对俄罗斯文化起着决定性意义的“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sup>23</sup>这种说法在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怀疑，走“第三条道路”无

---

<sup>19</sup> 荆宗杰：“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评析——以‘多极世界理论’为例”，《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第66~68页。

<sup>20</sup> 李兴耕：“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思潮与欧亚党”，《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2期，第25页。

<sup>21</sup> 王树春、朱燕：“大欧亚伙伴关系——多维视角下的深度解析”，《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页。

<sup>22</sup> 林精华：“民族性、民族国家与民族认同——关于俄罗斯民族史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第145~151页。作者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中心与莫斯科社会与经济高级研讨班“俄罗斯向何处去？”(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第6次全俄研讨会上，巴宾科教授做题为“俄罗斯是属于欧洲国家吗？”报告，报告声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种而复杂的。

<sup>23</sup>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杨晖、王大伟译：《俄罗斯思考》上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

---

法带给俄罗斯光明前途，而是会引领俄罗斯走向“第三世界”。从弗洛罗夫斯基到别尔嘉耶夫，从雅斯特任布斯基到特列宁，这些大知识分子对欧亚主义的批评和怀疑不可能不在精英阶层产生影响。只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尤其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美关系陷入僵局，俄欧关系日渐疏远，俄罗斯才不得不重视欧亚主义，开始“转向东方”。这是一种策略调整，在民族心理上还很难说已经对东方的文化和模式完全认可。

从政治集团的运作模式来看，俄罗斯是典型的精英治国。精英层在俄罗斯是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与决策集团和普通百姓存在脱节，当然也存在流动和互通。苏联解体向美国靠拢遭遇失败后，俄罗斯很多精英更加坚定地秉持欧洲主义，希望俄罗斯能够融入欧洲。有些人始终对亚洲抱有偏见，或只愿意接受与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合作，与中国商讨“一带一盟”对接仅出于制裁背景下的窘迫或服从国家战略的需要，并非出自真心。或出于高度戒备的心理，或出于语言文化的隔阂，部分精英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并不充分，甚至有一些误解。主要体现在：一是认为“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产物，伴有经济扩张目的；二是认为搞定政府间关系就可以不讲经济效益，“一带一路”投资不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三是认为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投资俄罗斯也是在为中国解决困难；四是认为“一带一路”只对中国有利，对沿线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没什么益处；五是认为“一带一路”缺乏多边谈判规则，上合组织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等等。导致误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哲学层面的，如欧洲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分歧；有发展道路层面的，如政府主导和市场决定的异见；也有具体认知层面的，如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按中国政府的意愿来投资还是按国际惯例来运营，等等。俄罗斯始终没有回答清楚“我是谁”和“怎么办”的问题，没有找到一条有俄罗斯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其发展中的主要障碍。这个障碍无形地存在于俄精英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和分裂。所以，自我认知和发展战略，这两个问题看似与“带盟”对接不相关，但它们在深层决定了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前行方向，势必会影响到中俄合作的程度与规模。可以说，恰恰是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和发展战略的模糊性阻碍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

### **以新欧亚主义破解对接难题**

如果说，以往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基本等距发展，且具有一定的内生性，那么特朗普执

---

政后，特别是 2017 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同时美国将中俄两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三国关系的距离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显著的外部效应下，中俄关系进一步拉近，并强化了战略协同。“带盟”对接的意义已经超越中俄两国之间，成为新兴国家共同应对外部挑战，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基石。

2019 年 6 月 7 日，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开展各领域合作的重要优先合作伙伴。双方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积极开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合作，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网络电商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就跨界资源利用和保护、跨界自然保护区建设开展有效合作。我和普京总统达成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共识。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同普京总统倡议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理念相通，两大倡议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相信这将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有利于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sup>24</sup>这当然是极正确的思路。然而，也要看到，还有一些因素阻碍着“带盟”对接和“大欧亚”理念互通。正如前文所说，俄罗斯一向以“欧亚经济联盟”的代言人自居，但却忽视了联盟内其他国家的“去俄化”情绪和现实的利益分歧，有些强推欧亚一体化的意味。首先，在推进贸易合作中不少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主要有：能源领域不同的利益诉求，中亚国家认为俄罗斯在中亚油气市场强买强卖，挤占本国利益空间；对欧亚一体化的目标与实现时间有着不同的认知，中亚国家并不希望匆忙结束谈判；建立统一的货币问题绝非易事，涉及经济主权，等等。其次，欧亚经济联盟本身的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对俄罗斯并不是无所求，而是希望得到经济实惠和安全保障，而俄罗斯经济发展乏力，国力下降，难以支撑其他国家的众多诉求，也无力摆平其他联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亚国家不得不搞大国平衡外交，实用主义而不是战略利益一致成为它们决定自身行为的首要因素。再次，后苏联空间各国战略利益是否一致，还存在疑问。欧亚经济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大一统的欧亚联盟，也就是俄罗斯主导下的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联盟，这是后苏联空间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接受的。最后，乌克兰问题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导致乌与俄愈走愈远，根本不可能考虑加入俄主导的欧亚联盟，而是一心想加入欧盟。而没有乌克兰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地位是下降的。<sup>25</sup>应该说，上面提到的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与俄

---

<sup>24</sup> 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新华社，2019 年 6 月 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8/c\\_112459610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8/c_1124596100.htm)[2019-10-02]。

<sup>25</sup> 陆南泉：“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路向何处？”，《经济观察报》，2015 年 8 月 3 日；陆南泉：

---

罗斯的自我认知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如不能放下后苏联空间“主宰者”的心态，尊重各加盟国主权，平等相待，则欧亚经济联盟难以顺利推进，也会影响到“带盟”对接的深入进行。

欧美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后，俄罗斯精英层对东方的态度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新欧亚主义前所未有地占据上风。这对推动“带盟”对接是有益的，但唯恐被外部势力同化或侵蚀的担忧使决策者格外注重本国利益，甚至忽视合作的基础正是“双赢”，这也是“带盟”对接中的潜在风险。笔者并不主张将新欧亚主义确立为国家主体思想，因为现代社会人们往往反对意识形态的统一，而将思想意识多元化奉为圭臬。但是，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多种政治理念纷争并不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形成。“国家治理首先要培育新的意识形态，塑造新的国家思想（National Idea），这样才能在社会和经济上调动民众的积极性”。<sup>26</sup>如若单单考虑民族因素，新斯拉夫主义者的主张很容易被民众接受，但若考虑到这也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则对其狭隘性不能不有所警醒。西化派主张效仿欧洲并融入欧洲本无可厚非，但从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欲彻底西化而不得，即使解体后改变其政治体制仍为北约所不容，则使人对其一厢情愿不能不报以同情。进入 21 世纪，中国以极快的速度在东方崛起，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从发展的视角对全球治理进行制度设计，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社会的繁荣。如果俄罗斯能够放弃“帝国”梦想，以平等、开放的胸怀融入世界，从新欧亚主义思潮中吸取精髓，去除糟粕，服务于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为国家发展战略找到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或许可以促进带盟进一步对接，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迈进。

俄罗斯不仅仅是欧洲国家，也不仅仅是亚洲国家，而是处于欧亚大陆的桥梁和两种文明的连接点。如果俄罗斯能够在自身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相统一，俄罗斯就会变得更强大。如若不能，则地跨欧亚和兼具两种文明本身就蕴藏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如同乌克兰的历史为今日之现状埋下的导火索那样。正像季莫菲·博尔达切夫指出的，俄罗斯虽然人口不多，但它具备独特的智慧和资源——比如辽阔的土地、水资源、能源、交通、文化、科学和技术。但是，想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俄罗斯必须自身达到和谐统一，也就是说要清楚自己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而且这种认知不能与其伟大的历史、文化和国际

---

“什么阻碍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经济观察报》，2016 年 11 月 11 日。

<sup>26</sup> [俄]尤莉亚·西涅奥卡娅著，华铭译，邢立军校译：“20-21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12 期，第 250 页。



---

政治地位相冲突。<sup>27</sup>如今，俄罗斯社会越来越关注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和弥赛亚意识，如何在统一的国家思想指导下走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是俄罗斯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只有俄罗斯真正强大，才能更自信地处理对内对外关系，包括“带盟”对接问题。在笔者看来，“带盟”对接的实质性深化，有待剔除某种极端主义倾向的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精英层得到更深刻的认同，有待欧亚大陆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得到更广泛更有力的支撑。

（责任编辑：崔秀梅）

---

<sup>27</sup> Timofei Bordachev, “The Key Word in ‘Russia’ s Pivot to the East’ Is Russia”, 《中国投资》, 2017年第7期, 第27页。